

文化研究视阈下的文学经典

李丹

摘要:20世纪中期,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悄然兴起,文学领域的相关争论便自此展开。对于诸如什么是文学经典——“中学和大学里系统研读的作品”的观点,有学者反对,有学者赞成。本文以卡勒《文学理论入门》为出发点,对上述有争论的几个观点,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结构主义 文化研究 文学经典

一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一些法国学者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研究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但都贴上了结构主义的标签,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文化研究。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代流行的批评理论持反对态度,并且将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符号学等视为“憎恨学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流派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这些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同时他还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强调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对作品本身语言风格的阐释。他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对立起来,不免有些过激。

《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界定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并指出文化研究内在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即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过来将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会更有所收获。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摧毁了文学经典,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文学经典,新的阅读方法和研究角度给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针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分两点进行了阐述。

第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文学经典。诚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被历来学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选出来,作为某个分析流派认为的经典,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作品以讽刺见长,戏剧《福尔蓬奈》就被作为研究詹姆士一世统治的经典文本。那么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是不再适用?重新映入人们视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这样的“杰出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具有某种文化研究领域的表征呢?我们知道作家创作出来一部作品,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文本,并不是文学艺术品,只有经过印刷传播、传递给读者、经过鉴赏分析才能具有艺术价值,整个过程才算是文学活动,这样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既包括了作者创作时的文本,又包括了读者对它的再创造、研究者对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定性,这也就难以框定出一个标准来评判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经典。只能说哪些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错综性”使作品获得独立的生命价值,永远拥有读者。

第二个争论在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执著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关注作品的文学性,以“对抗性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其本身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对文学

所做的解读实践,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阐释了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被列为了“经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读,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意义阐释空间,更加经久不衰。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必然具有价值,所谓的价值就是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文学对人类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的功能或者价值在中国古代就有“兴、观、群、怨”,在西方贺拉斯提出文学寓教于乐,都注意到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果仅仅从审美功能上认定一个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文学性,把作品当作作家一个人的成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之所以“经典”、“伟大”产生的社会根源,便抹杀了文学作品多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这些必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福柯的“疯癫”哲学观,哈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印证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析,又能够让我们有所借鉴,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顿和迷惑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也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文学作品不同形式的解读,比如各种改编经典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使得我们发现文本确定意义之外,所展现出来的文本以外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吸引受众眼球之所在。传统的文学经典面对新一轮的解读,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挑战。一方面我们所谓的文学经典,是与在与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比之下,显示其特殊性的一类文学艺术,比如在叙事技巧,主题价值,材料选取等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或者说更具有宏大叙事、人文关照,是放在整个文学史和人类历史的长河上来选取比较突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同时期、同类作家会受到忽视。但另外一方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的出现和解构思潮的影响下,涌现出大量新材料,这就使得各种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边缘文学”和其他相关的文化产品获得高度的关切,可能从它们中挖掘到某一领域的典范,这就使得它们跻身于“经典”之列。按照布鲁姆一派人的说法,不能用文化理论来阐释和挖掘他所谓的“经典”,这是对经典的亵渎和破坏,也就等同于这些经典凌驾于社会文化和理论之上,孤立起来,那这些经典又有什么意义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没有价值的作品,必将被人们所遗弃,取而代之的将是那些所谓的“边缘文化”。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董孝喁.美国文化概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李丹,女,生于1988年9月2日,目前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文艺学专业学术型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播。